

红

旗

飘

飘



29

中国青年出版社

红

29

旗

飘

飘

☆ 中国青年出版社

(京)新登字083号

红旗飘飘(29集)

——纪念新安旅行团成立五十周年专辑

本社编

*

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 发行

社址：北京东四12条21号 邮政编码100708

山东新华印刷厂德州厂印刷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

850×1168 1/32 9印张 2插页 200千字

1985年9月北京第1版 1995年10月山东第2次印刷

印数 14,001—24,000册

定价 13.40元(平:12.10元(精)

目 次

纪念新旅 学习新旅(序言).....	张爱萍	1
新安旅行团.....	张 牧	6
——我的一些回忆		
拨动伤兵的心声.....	大 朋	152
——回忆新旅的伤兵之友队		
桂南前线突围记.....	大 朋	181
——回忆新旅西南工作队在桂南前线的经历		
战斗在贵阳的一年.....	张泉 大朋(执笔)	203
德威 张渲		
——新旅贵阳工作队办履三小学回忆		
用笔去战斗.....	大 朋	226
——回忆新旅的临时写作委员会		
重振旗鼓 蓬勃发展.....	大 朋	233
——记新旅在苏北盐阜区汇合之后		
新旅在解放区.....	左 林	262
黄金般的革命少年时代.....	林铭纲	268

纪念新旅 学习新旅

张 爱 萍

今年是新安旅行团成立五十周年。五十年前，一批儿童少年为了宣传抗日救亡，宣传革命真理，从江苏省淮安出发，走了全国二十二个省、市，行程五万多里，为争取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今天，纪念新安旅行团成立五十周年，用他们的事迹向广大青少年进行爱国主义和革命理想教育，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

新安旅行团(以下简称新旅)成立于一九三五年十月，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在国民党统治区组织起来的宣传抗日的少年儿童团体。

五十年前，我们国家正处在民族存亡的关键时刻。由伟大的人民教育家陶行知先生创办的江苏省淮安县新安小学校的一群少年儿童们，在老师汪达之同志的带领下，积极响应中国共产党抗日救国的号召，在上海中共左翼教师联合会支部的领导下，组成新安旅行团。他们在连吃饭都没有保障的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冲破国民党反动派的政治压迫，毅然走出学校，到全国各地去开展抗日救国的宣传鼓动工作，为实现全国抗日和争取抗日战争的胜利，作出了贡献。

一九四一年，皖南事变以后，国民党反动派用尽种种手段对革命人民进行迫害，新旅的工作也处处受到阻挠、破坏和监视，无法再进行公开活动。遵照党的指示，新旅转移到苏北抗日民

主根据地工作，从这以后，我和新旅有了直接的接触。

当时，新旅的团部就设在新四军军部旁边（作者当时任新四军三师副师长），地点就是现在的江苏盐城。那时，苏北抗日根据地创建不久，人民政权刚刚建立，战斗频繁，物资条件十分艰难。新旅的团员们在刘少奇（当时任新四军政治委员）和陈毅同志（当时任新四军代军长）的关怀下，和抗日根据地的军民同甘共苦，成为华中地区很有影响的一支儿童和青少年工作的力量。

记得，那是一九四二年初春的一天，刘少奇同志在参加了华中局扩大会议后，挤出半天时间，和陈毅同志一起接见了新旅全体同志。这时新旅的团员一共有六十多人，最大的十八岁，最小的还不满十岁。少奇同志对大家说：“新旅一定要存在下去。你们是一个有光荣历史的革命团体，工作有很大成绩，在国内、国外有广泛的影响，这是不可多得的。国民党迫害你们，共产党一定要保护你们，而且还要让你们的团体和你们的工作有一个很大的发展。”这对新旅是一个多么大的鼓励啊！就是在这次会面时，少奇同志和陈毅同志说：“华中地区的少年儿童工作都交给新旅同志们去做，第一步先在苏北组织起十万儿童。”这对新旅又是多么大的信任啊！大家听了激动得欢呼雀跃，个个都表示：一定要完成陈毅军长和少奇政委交给的光荣任务！

紧接着，新旅派出工作队分别到阜宁、盐城、淮安、建阳、涟东、阜东、射阳等县组织儿童团、少先队；开办儿童干部训练班。他们走到哪里就工作到哪里——他们当“小先生”，开展扫盲活动；他们教唱抗战歌曲，进行抗日宣传；他们演出舞剧、秧歌和皮影戏等，慰劳新四军和抗日军烈属，动员和组织群众参加反“扫荡”斗争；他们还把儿童团员组织起来帮助民兵站岗放哨，捉汉奸；他们还和老百姓一起参加夏收、秋收和支前工作，成为根据地一支十分活跃的力量。我当时为新旅和儿童团们拍下了不少

照片,现在看来,这正是他们当年生活和斗争的真实写照。

在此期间,新旅小同志先后编辑出版了《儿童生活》、《儿童画报》、《每月新歌》等刊物。一九四三年七月,《儿童生活》为了抗议国民党反动派向陕甘宁边区的进攻,打退敌人的“扫荡”,发动了“十万儿童签名运动”。陈毅同志曾亲自为《儿童生活》题字:“抗战事业应该让儿童参加。新四军愿意做儿童们的良友。”

新旅的工作一直得到党中央和新四军的关怀帮助。毛泽东同志在日理万机的繁忙工作中,亲自给新旅同志写了复信,勉励他们“努力工作,继续前进,争取民主中国的胜利!”周恩来、刘少奇、邓颖超同志几次接见新旅的代表,陈毅等同志经常参加新旅的集会,对他们的工作、学习和生活,关心得更加具体。记得,当时根据地的生活十分艰苦,新四军战士宁肯自己压缩供给,也要保证让新旅小同志吃饱。每次战役缴获的战利品,战士们总要分一部分给新旅送去。一九四三年陈家巷战役后,我特意让部队给新旅送去几麻袋盐(陈家巷是产盐区)。

一九四五年五月,抗战胜利前夕,盐阜区第一次少年儿童代表大会召开了,我和黄克诚等同志都参加了这次大会,还讲了一些鼓励的话。这已是四十年前的事了,今天虽然记不清当时具体讲了些什么,孩子们一张张稚气的笑脸,却仍留在我的记忆里。当时盐阜区村村都建立了儿童团,有组织的儿童团员已达到十八万人,新旅超额完成了党交给他们的组织十万儿童的任务。

在解放战争中,新旅随华东野战军转战苏北、鲁南、鲁中、冀鲁豫等地区,是一支很受各部队欢迎的随军宣传队。上海战役后,新旅小同志们擂着腰鼓,参加了解放上海的入城式。一九五二年,我们国家进入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新的历史时期,新旅和其他文艺宣传团体合并,组成了现在的上海歌剧院。

新旅从成立到结束，经历了十七个年头，这是党领导中国人民经过艰苦卓绝的斗争从而取得最伟大胜利的时期，新旅的同志们也在革命的风风雨雨中，度过了他们的儿童和青少年时代。

五十年的岁月，象流水一样地过去了，今天，生活在社会主义新时代的青少年们，可以从新旅身上汲取些什么呢？

一、要象他们那样热爱祖国。具有献身精神。在民族危亡的严重时刻，他们发出了“为民族生存奋斗！”的誓言。高唱着：“同志们，别忘了，……我们的家破产了，我们的国遇了盗。听啊！到处是敌人的飞机和大炮。同胞们，别睡觉，把一切民族敌人都打倒！都打倒！……”（由田汉作词、张曙作曲的新旅团歌）的豪迈歌声，走向抗日救国的革命征途。歌词如实地写出了当时革命斗争的形势，体现了新旅小同志崇高的志向和热爱祖国的精神。那时候爱国就是救国，就是要不怕艰难和牺牲，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今天爱国就是要努力建设社会主义祖国，从小树立为国家、为人民服务的远大理想，为把祖国建设成为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而努力学习。

二、要象他们那样具有远大的志向。不怕艰苦，自己能做的事情自己做。新旅从淮安出发时，他们最大的二十岁，最小的才十二岁，但他们人小志气大，离开了学校，告别了父母，走上抗日救亡的征途。他们不怕艰苦，热爱劳动，他们从来都是一切自己动手，衣服自己洗，饭自己做，工具坏了自己修，没有钱，自己写稿子、卖报纸，推销进步书籍，靠自己的双手克服困难。没有地方住，自己搭草棚子住，没有粮食，他们靠吃胡萝卜、盐蒿子度日，也不向困难低头。今天，象他们一样大的孩子，可能还常常依偎在爸爸妈妈身边，把自己当小孩看待呢。可是新旅的团员们，十几岁时已经投身到救国救民的革命洪流。今天的生活条件比过去是好千百倍了，但是新旅同志胸怀大志，不怕艰苦，大胆创造、

勇往直前的精神，仍值得今天的青少年和儿童继承和发扬。

三、要象他们那样刻苦学习，培养高尚的品德、情操，努力使自己成为德才兼备的有用之才。当年，民族危机和战争环境，剥夺了新旅同志在课堂上系统学习科学文化知识的机会，但他们在对敌斗争的艰苦环境里，在十分繁忙的工作和极端困难的物质条件下，从不中断学习。他们一有空闲就学文化，自编自创文艺节目，许多人都是在实践中靠自学成才的，如范正、王山等同志，有还新旅的“小画家”王德威，十一岁参加新旅时学画，经常在街头画宣传画。解放后仍坚持自学，刻苦创作，成为全国知名的画家。新旅为党和国家、军队培养和输送了一批人才，他们中间有党的政治工作者，文艺工作者、新闻工作者和工程技术人员。今天的青少年更应好好学习，天天向上，掌握为人民服务的本领，使自己成为建设祖国的有用之才。

我想，这样来纪念新旅，学习新旅，才是有意义的。

新安旅行团

我的一些回忆

张 牧

新安旅行团，是三十年代我党在国民党统治区组织和领导的一个青少年和儿童的革命工作团体。它成立于一九三五年，结束于一九五二年。

在江苏省淮安县城内的新安小学里，有“新安旅行团团史陈列馆”，陈列有关新旅的文物和资料，其中特别引人注目的是毛泽东同志的一封亲笔信：

新安旅行团各位同志们：

来信收到，极为感谢！祝你们努力工作，继续前进，争取民主中国的胜利。

毛 泽 东

一九四六年五月二十日

毛泽东同志的这封信，曾给新旅同志们以极大的教育和鼓舞。

我是新旅最初的十四个团员之一，经历了它自一九三五年到一九四二年这段历史的全部过程。苦于手头没有保存下一点历史资料，只能依据报库里翻出的当年公开报导的一些材料和自己的记忆来写这篇回忆了。

古庙里的一所新型学校

新安旅行团的名称来源于它的母校——新安小学。

新安小学成立于一九二九年六月六日。首任校长是陶行知先生。学校以实践陶先生倡导的“生活教育”为宗旨，主张“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实行“教学做合一”，提倡“手脑相长”、“即知即传”。要学生们学做事、学做人，不要做书呆子。反对“读死书、死读书、读书死。”反对当时盛行的封建复古和奴化教育。它的办学方法和教学内容，学生的构成和师生关系等等，都和当时国民党官办的学校不同。在三十年代的旧中国，它是一所完全新型的革命的学校。

学校的学生，有基本学生和走读生两种。走读生全是学校附近的贫苦农民、渔民和小商贩们的子弟，他们可以一面在家参加生产劳动，一面到校学习文化知识，学生除自备学习用具外，学校不收任何费用，这种办法，极受民众欢迎。基本学生也都全部免费，他们住在学校，由学生自己民主管理学习、生活和生产劳动，老师只作指导。一九三五年时，这种学生已发展到十五人。在基本学生中，有一贫如洗的穷孩子，有党的地下工作者的子女，也有因不满于旧教育制度、仰慕陶行知先生的教育主张而来的较为富裕人家的子弟。他们的年龄大的二十岁，小的十二岁，项英同志的女儿项苏云那时只有五岁。他们的文化程度有中学、有小学，也有文盲。学校每天的学习、生活和劳动，都在当天的早会上民主讨论决定，然后由基本学生轮流担任总值日，负责主持一天的作息。学习的内容，除一般文化基础知识外，每人每天都要坚持写生活日记，每周出版一期十六开本活页杂志型的《莲花周报》，用以刊登学生的学习成果。每周也安排若干科学实验项目，当时称作“科学把戏”，以陶先生主编的《儿童

科学丛书》为主要学习材料，通过它学点理化和自然常识。每天早上，要集体练习发音，然后学习唱歌。起初，经常唱的都是陶先生写的《锄头歌》、《镰刀歌》、《手脑相长歌》、《自立歌》等，后来，每遇上海有进步歌曲发表，如《大路歌》、《开路先锋》、《义勇军进行曲》也都在唱歌时间里学唱。歌词既是文化教材也是思想教材。当时的国难教育，在学习中占有很大的比重，它深刻地启发和激励了学生们的爱国主义思想。

至于生产劳动，主要是种植蔬菜，学校备有一整套铁、木、泥瓦工具，维修农具、铺路砌墙，事事自己动手，还办了一个小型粉笔制造厂。学校附近的菜农、渔民、泥瓦匠等都是学生在劳动中的老师。

生活上也全由学生自己管理，每天派两人在厨房值日，负责采购副食和制作三餐饮食。每天晚上有生活晚会，对当天的学习、劳动和生活进行讲评，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培养学生们爱集体、讲民主的风气。学校里推行“小先生”制，同学之间开展互教互学。“小先生”还定期给群众送学上门，既教孩子也教大人，既教识字也向他们宣讲国难形势。在老师的指导下，通过“小先生”活动，后来逐步组织起莲花街的蒲农，用自己种植的蒲草作原料，编织蒲包、蒲扇、蒲鞋等，自产自销，这就免掉了中间剥削，改善了群众生活。因此学校师生和群众的关系十分亲密，群众爱戴学校，尊敬老师，称颂这些人是“古庙里的活菩萨”！

新安小学的老师，和学生同甘共苦，吃、穿都和基本学生一样。他们既是学生的老师，又是学生的兄长；既是群众的先生，又是群众的朋友。他们把自己的一切，无条件地贡献给学校和当地群众，却从不在学校收入中支取一分钱的薪俸！特别是汪达之先生，为了改造旧中国的教育，为了民族解放事业，始终和学生同甘共苦，其献身精神尤为突出。陶行知先生曾经高度

颂扬他是“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的人，一九四二年，刘少奇同志曾几次当面赞扬他是位“党外的布尔什维克！”

旧有的新安小学校早已毁于日寇的炮火。一九四五年，苏皖边区政府拨款重建了校舍。一九四六年它又毁于蒋介石反动军队之手。解放后，淮安县人民政府把它再建于淮安县城西门里。

从“新安儿童自动旅行团”到“新安旅行团”

一九三一年的九·一八事变，日本帝国主义没费一兵一卒，几天之内就占领了东北三省，三二年一月，又进攻上海，把上海及其附近地区划为“非武装区”，这年二月，又攻占了热河省。四月，日本侵略军的铁蹄进了长城以内的滦东地区，逼进了北平和天津。日军的侵略，激怒了每一个爱国的中国人，抗日救亡运动开始兴起，陶行知先生在上海组织了“生活教育社”。具有强烈爱国主义思想的汪达之先生考虑：与其领着孩子守在淮安城边这个小天地里实践“生活教育”，倒不如让孩子们到民族解放斗争的漩涡里去经受实际的教育和锻炼。于是，一九三三年秋天，他毅然将新安小学当时仅有的七个基本学生组织起来，称作“新安儿童自动旅行团”，按照学生们在校时自己管理自己的一套办法，到正在进行民族解放斗争的大城市上海去旅行。

儿童旅行团在镇江和上海旅行了五十天。他们参观工厂，到棚户区了解工人们的生活情况；在帝国主义的“租界”上见到耀武扬威的英国兵、法国兵、日本兵；见到黄浦江上挂着米字旗、星条旗、太阳旗的兵船；见到英国的、法国的巡捕以及他们雇佣的印度、安南巡捕殴打和捕抓中国人；看到了兆丰公园、法国公园门上高挂着的“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牌子！并专程去吴淞口、炮台湾一带凭吊了“一·二八”战场。在五十天中，他们依靠

自己上街贩卖报纸，到各大中学校去演说等方式取得生活费用，终于胜利地完成了学习任务，回到淮安。

儿童旅行团这次大胆实践的成功，轰动了上海以及江苏省的教育界和新闻界。上海的华文、西文大报都以大量篇幅报导了他们的活动，其影响迅速扩展到全国许多城市以及南洋群岛和旧金山一带的华侨中。他们的行动，受到了陶行知先生和上海进步文化教育界的热烈支持，尤其是陶行知先生真是兴奋极了，他在《普及现代生活教育之路》一文中说：“新安儿童自动旅行团来沪，不但在中小学演讲，而且在大夏、光华、沪江各大学演讲。我向一位大学教授问，小孩子们讲得如何？他说，‘几乎把传统教授的饭碗弄得有些不稳’，虽然是千古奇闻，但确是铁打的事实。”他在给汪达之先生的信中说：

儿童旅行团来，大家都欢喜。我以小工人之礼待之。……你要我估一估儿童旅行团的价值，这是新时代的无价宝，姑且定它万万万万金元吧。这样伟大的宝藏，世界上谁也没有，却为新安所得，使福特、摩尔根辈见着未免要生小巫见大巫之感。而新安不敢视为已有，愿公诸天下后世，这又是富翁们舍不得的了。好，如果你讨厌黄金，那么请听我唱吧！

题儿童旅行团

一群小光棍，点点有七根；
小的十二岁，大的未结婚。
没有先生带，父母也不在；
谁说小孩小，划分新时代！

儿童旅行团胜利回到淮安，汪先生立即组织他们把旅行中的见闻写了出来，集为《我们的旅行记》一书，由上海儿童书局出

版发行,进一步扩大它的影响。

儿童旅行团的成功,给了汪达之先生一个新的启发:国难日益深重,应该组织一个规模更大的旅行团,到东南、华中、华北各个省去,一边学习,一边做抗日救亡的宣传工作。于是,他反复奔波于淮安上海之间,吸收基本学生,积极酝酿筹组新的团体。

汪先生的设想和努力,陶行知先生全力赞助,并在“生活教育社”的同仁中进行酝酿和讨论。当时,“生活教育社”的主要负责人和骨干人员如丁华、王洞若、张敬仁、孙铭勋、孙宗麟、戴伯韬等同志,他们既是陶行知先生的学生或密友,又是上海左翼教师联合会中共党支部的主要成员,丁华同志、王洞若同志都当过它的支部书记。对于汪达之先生的设想,教联党支部多数同志是既赞成又担心。担心的是,蒋介石正全力围剿红军,国民党统治区是一片白色恐怖,在“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下,一切公开的抗日言论和行动都是被严格禁止的,新旅要到各地去宣传抗日,政治上不安全,经济上没有固定来源,生存有困难。丁华、王洞若等同志则是全力支持,他们认为,采取少年儿童教育团体的名义,对外以实践“生活教育”和宣传孙中山遗嘱,即“唤醒民众,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为旨,孩子们目标小,安全问题不大。经济上,出发前可以从上海各爱国厂商那里争取支持,搞一些宣传工具和物质装备。组织新旅的计划终于确定了。

为争取社会各界进步人士的支持,汪达之先生以新安小学的名义起草了《为实验基本学生长途修学旅行团宣言》,其中说到:“看,我们整个民族的生活是怎样了?我们现实环境又是怎样?……帝国主义明抢暗夺,有了九·一八,更来一个一·二八,……当前的时机,在历史的记录中,有更严重于此的吗?”“长途修学旅行计划开始了。请来督责,请来指教,请来赞助我们力

所不及吧！”

陶先生毅然把安葬母亲用的一笔人寿保险费五百元捐了出来，汪达之先生运用陶先生在上海的联系，并以他的名义，得到吴耀宗、黄炎培、吴蕴初先生等人的帮助，从上海基督教青年会购买了一架旧的“德发牌”无声电影放映机（当时有声电影只有少数几个大城市才有），又从中华无线电研究社弄了一台小型汽油发电机和扩音机、电唱盘，从联华、明星影片公司弄来了《一·二八淞沪抗战纪实》、《民族痛史》、《抵抗》等几部旧影片，通过音乐家任光同志从英商百代唱片公司弄了《义勇军进行曲》等进步歌曲唱片，又买了一架幻灯机。一些爱国厂商又捐了一些毛巾、挂包、油布、布和一些日常旅行用药，这就是筹集到的全部物资，前后花了一年多的时间。

到一九三五年，民族危机更加深重了。八月一日，我党发表了著名的“八一宣言”，全国人民要求抗日救亡的呼声也更加高涨起来。八月里，汪达之先生把已到手的东西陆续运回淮安。王洞若等同志从上海请来了工人师傅，同志们经过一个多月的学习和实践，终于学会了操作和维护这些机器的技术。这样，新安旅行团正式组织了起来。

最初自愿参加这个团体的有十四个基本学生，他们是：

朱金山（已故）、嵇钰（纪宇，已故）、杨永鑫（白晞）、徐志贯（徐之光，已故）、张俊卿（张翼天）、靖秉铨、刘昭朗、程昌林（凌则之）、靖秉铎（已故）、张俊鑫（张早）、曹维东、曾兆寿（曾里）、左义华（左林）、张敬茂（张牧）。

汪达之先生是“顾问团员”。总计十五人。公推了徐志贯、嵇钰、朱金山三人为团务干事会成员，其余的同志也分别担任了对外交际、文字编辑、医药、行李管理工作，并由徐志贯同志任总干事。为使全国人民了解这个团体，汪达之先生又亲自草拟了

新安旅行团《告国人书》和《告全国小朋友书》两个文件，以邮寄的方式分送全国各教育、新闻单位。当这一切就绪之后，汪达之先生即以全体同志的名义，给陶行知先生写了一封汇报信，并初步决定在这年的十月十日从淮安出发。

讨饭也要去宣传抗日

十月初，新旅出发前的一切准备工作都已完毕，只等陶行知先生回信后，就要按预订日期启程了。虽然深秋的寒气已向人们袭来，但校内外却是热气腾腾。每天都有走读生的家长们，莲花街的乡亲们，来校话别，晚上，我们在学校院外的空地上为乡亲们放电影。在淮安放电影这是头一遭，学校附近真是热闹极了。

十月四日，日本内阁提出了所谓“广田三原则”，日本驻中国的特务机关长土肥原贤二，又公开要求国民党在华北的军事头目——二十九军军长宋哲元出任所谓“华北协同防共委员会”的委员长，而国民党中央政府和宋哲元都不敢公开拒绝。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步步紧逼，形势更加危急了！而国民党政府对日的态度十分暧昧。却全力围堵北上抗日的中国工农红军。与此同时，在苏北和鲁南一带又发生了大水灾。据当年国民党的《新江苏报》记载：“十月二日，沂河南堤溃决，水流澎湃，有如山崩栋折……，爷娘唤子，童稚呼亲，一望大地，四面汪洋，尸体漂流，鸡犬不免……。”淮安一带到处可见一群群饥寒交迫的灾民。

几天过后，陶先生果然来信了，但汪达之先生见信后，却没有什么愉快的表情。当天晚上，他把十四名团员一起召集到他的住处，召开例行的生活晚会。在一盏灰暗的煤油灯下，大家在楼板上席地而坐，都急切地等待着他讲话。会议一开始，他先带大家唱了一首经常唱的《自立歌》：“滴自己的汗，吃自己的饭；自